往事五十年断忆

康　荫　著

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目　　录

引言
第一章　成年经历简叙…… (1)
一　参加革命动因…… (1)
二　走上新闻岗位…… (5)
三　调往广播学院…… (9)
四　新闻学术之争 …… (13)
第二章　党报育我成长 …… (18)
一　新闻报道主体 …… (19)
二　进行连续报道 …… (23)
三　宣传动员参军 …… (27)
第三章　走上新闻岗位 …… (31)
一　顺应形势发展 …… (31)
二　保卫胜利果实 …… (35)
三　宣传参军参战 …… (38)
四　大力支援前线 …… (42)
第四章　高原采访纪实 …… (46)
一　翻越首座高山 …… (47)

二　红军留下脚印 …… (49)
三　战天斗地奇迹 …… (51)
四　高原道班工人 …… (55)
五　运输线上模范 …… (57)
六　公路带来繁荣 …… (60)
七　一户藏胞变化 …… (63)
八　难以忘怀一页 …… (65)
第五章　从历史到论理 …… (68)
一　英美外商电台 …… (69)
二　伪满广播电台 …… (72)
三　官方广播电台 …… (77)
四　私营商业电台 …… (81)
第六章　干校难以忘怀 …… (86)
一　运料煮料调料 …… (87)
二　亲自尝试体味 …… (91)
三　改进喂养方法 …… (94)
第七章　清理思想作风 …… (98)
一　从事实到新闻 …… (99)
二　从真实到政治 …… (101)
三　从个别到一般 …… (104)
四　从客观到主观 …… (107)
五　从实践到理论 …… (110)
第八章　新闻研究思路 …… (114)
一　根本指导思想 …… (115)
二　主要历史线索 …… (119)
三　现状重要基础 …… (125)
第九章　研究源于资料 …… (130)

一　利用信息资源…… (131)
二　参与新闻活动…… (136)
三　自办站台报刊…… (140)
四　发布新闻信息…… (144)
第十章　课题出自实践…… (149)
一　联系实际适度…… (150)
二　新闻模式基因…… (155)
三　事业产业相成…… (161)
第十一章　增强特色意识…… (166)
一　主要思想特征…… (167)
二　新闻思想体系…… (172)
三　独特新闻风格…… (178)
第十二章　注重理性因素…… (184)
一　从事实到事理…… (186)
二　从现象到本质…… (188)
三　从具体到抽象…… (193)
四　从眼前到未来…… (196)
第十三章　坚持正确导向…… (201)
一　正视事物预兆…… (202)
二　把握时代特征…… (206)
三　弘扬开创精神…… (210)
四　显示发展方向…… (214)
第十四章　教学相辅相成…… (218)
一　讨论结合辅导…… (219)
二　讲解抓住要害…… (223)
三　正视疑难问题…… (229)
第十五章　身教重于言教…… (236)

一　治学需要严谨…… (237)
二　对人宽严相宜…… (241)
三　对己从严自律…… (245)
第十六章　社会活动启示…… (250)
一　新闻学术讨论…… (251)
二　新闻定评活动…… (254)
三　新闻职称评定…… (256)
四　学术论著评奖…… (263)
第十七章　把握历史转折…… (267)
一　关于党性原则…… (268)
二　关于群众路线…… (272)
三　关于新闻竞争…… (274)
四　关于党报体制…… (278)
第十八章　队伍关系大局…… (282)
一　遵守行为规则…… (283)
二　恪守职业道德…… (287)
三　保守国家机密…… (293)
后记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引　言

我写这篇往事断忆的文字,是在近期完全离开工作岗位之际,是应有些已工作的研究生提议而为的。这正是自己从事新闻工作50年时,所以起了这个书名。

当初,要对往事回忆,就想到一个问题:对某些时期的工作,个人不宜自作什么评价,应由世人从社会实践作出评估,这正像任何人对自身的言论或行为难以自我评定一样,都要由科学实验、社会实践或实际佐证来检验和定论。所以,这篇回忆力求避免自我称道或自作定评。

对自己来说,专心回忆往事倒是"娘胎出生"头一回。可谓千头万绪,从何下手?经再三思索、回顾和考虑,才想到要明其主旨、择其要者、叙其历程,思路也就比较清楚一些。又因是回叙性而不是纪年性,是片断性而不是系统性,或是局部性而不是完整性,所以,要力求去粗取精,去伪存真。不过,由于往事纷纭,时光流逝,有些经历过的重要事情光凭追忆已不大清楚和准确,又因众所周知的客观原因,自己积存的笔记和资料大都早被"抄"走,有些需要记叙的事情只好作罢!

当然,回忆往事,应以经历为线索,以自身的实际为依据,并以真实准确为原则。这里需要说明:50年的新闻工作,只有逾年的短时间因工作需要调做其他事情,这对自己的整个经历无多大影响;其次,新闻工作的前期主要是从事新闻业务,中期和后期则专事新

闻研究、管理和教学,所以教学和研究方面的回叙的篇章多些,这也顺理成章;再次,以往的10年“文革”是一种特殊的经历,其中到“五七”干校劳动锻炼,对自己倒是颇有教益,可说“因祸得福”,并还保留了当年的记事本,所以也作些简要叙述。

对往事的回叙,我采用的方法,除开头总叙外,主要有以下几种:

一是片断式:因时间长,变动多,所以不是连续的,而是片断的,也不是整体的,而是局部的,即是某些经历中的一段,或是相关事情的一个段落。这种方法,也常为某些回忆性的文章或著述所采用,我也愿予以借鉴,并乐而为之。

二是专题式:是专就新闻活动某些方面的追叙和实录,这属于自身较长时期所从事这项工作的本职。所以,这个长篇回忆,在新闻业务、研究、教学诸方面,大都设立专章叙述,又因是专题,即以同类的事情,或是纵叙,或是横述,交错运用。

三是体会式:是选择实际活动中较有体验领悟的部分予以叙述。其中,或是对某些事情的实际感受,或是对教学和研究缘由的领会,或是对教和学相互关系的体察,或是对新闻外部征象和内在因素的体验,或是对队伍掌握正确方向的领悟等等,这都带有某些经验性的成分或因素。

四是论述式:系对某些论点以事实论证准确与否所作的分析和叙述。这是教学研究中常用的一种方法,即对外界不同观点用诸多确凿无疑的论据予以判断和剖析,用来证明某种论点的正误的程度,因而带有理性因素。

第一章
成年经历简叙

上海是自己的出身之地,生于一个中等资产阶级的家庭,家住“法租界”大木桥南端的毛家宅,只有父母和姐姐。早年父母种菜务农,祖父去世时分得几亩田地,就卖掉了一些,依靠万元存款不再务农,过着寄生性的生活。我的家庭成分,是1944年滨海地区党校学习时由小组讨论并经组织确定的。

在求学期间,我上过两年私塾,后上宾明公学、南洋中学附属高小和初中。平时少言寡语,喜欢看课外书刊和电影。初中肄业就由邻居介绍,进原霞飞路中段一家名为《柴拉》的俄文报馆当排字学徒,半年后转为工人。逾两年就爆发抗日战争,家里搬到大木桥北端“租界”地的亲戚家,房屋也被日寇烧毁,不久我也失业在家,固然生活不受影响,但感到无聊,就常看报。那时,上海有进步报纸,介绍延安抗日军政大学、陕北公学、鲁迅艺术学院的情况,并先后刊登一些青年去陕北的名单。这类消息对我很有吸引力,现在想来正是“绝处逢生”,成为自己向往之处,就投书《大英夜报》,竟被刊登出来。

一　参加革命动因

我投书进步报纸,并决心去延安,走抗日救亡这条道路,可说

是在关键时期的一种选择。

主要原因有三:

一是受了左翼电影的影响　在成年之际,自己可说是个“电影迷”,进步影片对我影响不小,诸如《大路》、《新女性》、《渔光曲》、《桃李劫》、《夜半歌声》、《风云儿女》、《马路天使》、《青年进行曲》、《迷途的羔羊》、《狼山喋血记》等等。当然,国民党报纸的反共宣传,如“朱毛赤匪”、“共产共妻”、“杀人放火”等,不能说不受一点影响,但在住地西边,即枫林桥南,国民党刽子手经常用刀砍枪杀一批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。这是亲眼所见,因而自有一个比较和鉴别,即进步电影对自己起着主导作用。

二是出于爱国主义思想驱使　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,淞沪“一二八”事件及十九路军的抗敌斗争,卢沟桥事变后爆发抗日战争,接着“八一三”后上海四郊沦陷,“租界”成为孤岛。在民族危亡的情况下,我自感在上海没有出路,就背着母亲(父早已去世)投书报馆,并“秘密”相互来往,约定的其他 5 人,我都不认识,有些是到我家后他们相约的。后经商定决心去延安,并要避开日寇占领城市,故先去香港到广州找八路军办事处。这样,决定去香港的日期后,才告诉家人,目的是要路费。

三是向往苏联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　当时,这种思想是朦胧模糊的,不很清楚。上海“法租界”有不少白俄,听说苏俄革命后才逃到中国,在霞飞路一带经常可见有些白俄喝得醉醺醺,在马路边东摇西歪。我们前往香港听说广九路战事日紧,故绕道去澳门再到广州,但八路军办事处已搬往长沙寿星街。到长沙八路军办事处说明来意后,又经单独面试。当问到苏联的社会制度时,我只是说苏联社会好,那里没有人剥削人。因在上海,我也看过如《第四十一》等苏联电影。

以上是决心前往陕北的主要因素。其间,既排除了母亲的阻

挠,叫来舅舅说是“国民党知道了要杀头的”,又顶住了某些人在途中的动摇。那时我们到长沙后,听说武汉和广州先后被日本侵略军占领,原定要路经的武汉去不了后,有些人就思想动摇,要回上海,有的要独自前往陕北,剩下我和孙镇波,还有一人是在火车上相识也准备去延安的。当时,我意识到会出问题,就去信家里说没有我的亲笔信就不要寄钱。不出所料,解放后才得知,确有人冒用我的姓名,家里已寄出百元汇款,接到我的信后才急忙去邮局追回这笔汇款,只付了少许的手续费。

在长沙,我们经办事处开了介绍信,三人决定步行前往西安。办事处同志说,这条路的沿途都是国民党的地区,要十分小心,特别是到西安只能从西门进城,不能从南门、东门进去,那里对去延安的青年查得特别紧(大意)。路途中确也艰辛甚而遇险。我们行至宜昌东的一个小镇边,就遇到警察盘问,因事前已有思想准备,就说是到西安去投靠亲戚的。后出来一个披三角皮带警官模样的人,又再三盘问,我们还是按照原话回答。他让我们到院里说:“你们不用怕,要去延安有事相托。”我们再三否认。他就带我们到镇上找小客店住下,说是明天再来。第二天果真来了,带两双麻制草鞋和一封信,说是他妹妹已去延安,来信说那里需要草鞋,并带我们到小镇饭馆吃了一顿午饭。这是一种巧遇,否则很难说能否到达目的地!

我们于 1938 年 10 月起,徒步两个多月才翻过秦岭到达西安。因办事处难以解决我们的过冬棉衣,就介绍去陕甘宁边区南部的泾阳县安武堡青年训练班,说是与抗大一样性质的学校。这年 12 月间,我们到达青训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。当晚,班主任冯文彬接见我们,问寒问暖,对我们不辞劳苦长途跋涉来到这里表示关怀。并说,中央已决定,抗大总校一部分、陕北公学和青训班要组成抗大一分校,先北上延安,然后东迁太行山区。

三天后,我们随队北上。当时,天气严寒,雪花纷飞,地冻三尺,吃的是苞谷小米,对我来说,这在过去的生活中从未遇到过。但是,在这个集体里,相互关心,互相帮助,共同行进,换了一个新天地。到劳山后说是不去延安,向东直奔靠近黄河的延长,在等待总校和陕北公学的学员前来之际,大家动手缝制发下的军棉衣片,这才穿上了棉军服。此后东渡黄河,越同蒲路,翻过绵山,终于到达了晋东南太行山区的西旺村驻地,即在八路军总部的附近,并于 1939 年 2 月正式开学。

抗大是理想教育的革命熔炉。我是属于第五期、19 队的学员,主要学习政治和军事,连队也有专职教员,强调理论联系实际,晚上经常举行紧急集合,假设敌人进行战斗演习。在艰苦环境和集体生活中,不能说生活不苦、不想家,但在这座熔炉中受到了严格锻炼,逐步养成集体生活的习惯,意识到应严格要求自己。在夜战演习中曾受到大队长陈华堂的表扬,白日着装竞走也取得第一名,分校的校报为我画了连环画。经几个月的政治理论教育和军事训练,初步懂得了革命的艰巨性和长期性,明确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——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,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,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,也初步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,就是为实现中国革命的理想奋斗到底。

1939 年 6 月 10 日,由队长刘远生、指导员李明清介绍,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,并进行入党宣誓。学习毕业后又留校学习两个月。当时,晋东南处于战斗的第一线,敌人分九路进行大扫荡,学校就迁到平顺等县境,抽空进行教学。我因身患疥癣症,住院治疗。其间,听说学校即将东迁,我就要求出院,经批准回到学校,同年冬全校东迁,于 1940 年初到达山东沂南县的垛庄。我分配工作,担任了连队的区队长。在袭击敌伪和反扫荡战斗中经受考验,曾受到指导员的表扬,但是有勇无谋,平时带队训练中常有不当之处,受到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队长的批评。不久,调到大队部做书记工作,又到校政治部任技术书记,这比较适合自己的性格,工作也较为顺利。

在这期间,我陆续写过几首小诗,被分校的校刊采用,其中有一首还被分校文工团谱曲演唱。后来,由于环境动荡,战斗频繁,1942 年秋学校暂时停办,一些同志到地方工作,我被分配到滨海行政公署当秘书。这一时期,因在行政领导机关,消息比较灵通,也常接触适宜公开报道的一些重要情况,就经常为省报写些消息或简短通讯,并得行署主任谢辉的支持。这样,在实践中初步摸索一些新闻业务知识,后来也成为专事新闻工作的起因。

二　走上新闻岗位

1945 年 8 月,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际,滨海区党委机关报《滨海农村》创刊两月,新华社滨海支社筹办之时,组织上调我到报社担任编委,主要是做支社的广播编辑,后任分社主任。从此开始做新闻工作,也基本上没有离开过新闻工作岗位。

当时,报社和支社是一个机构,报社社长兼支社社长,统一领导,分工协作,支社主要从报社新闻稿中选编有重要意义或有价值的向总社发稿。报社也不设专职的记者,遇到有重要的新闻线索都由编辑去采访,所以,我也常去党、政、军机关或县里采写报道。这样,又当编辑,又做记者,确是得到了锻炼,颇有收获。其间,社长吴建、总编宋英要我编报纸的要闻版。因是一项新的重要业务,我也比较注重选题,突出中心,组织稿件,安排版面,并力求通俗易懂。这样,做了一个短时期,对此项业务也逐步熟悉了一些。

全面内战爆发后,动员群众支援前线,打击进犯的国民党反动军队,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,就成为全区军民的一项中心任务。这时,组织上派我到滨海支前司令部和政治部创办支前小报,

做好舆论动员工作。在政治部主任刘导生直接领导下,独立制订宣传计划,确定各版选题,编定各类稿件,也常到一些支援前线民工团了解情况,或有选择地组织报道。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,基本上完成了支前工作的宣传任务。到 1948 年初,因地区行政机构调整,《滨海农村》报停办,分社也改为支社,我和少许报社留下的记者和发报台同志,在滨海地委宣传部领导下,主持一个短时期的支社发稿工作。

1948 年 10 月,解放战争迅速发展之时,《鲁中南报》创刊不久,组织上调我去报社,参加编委会,代理编辑部副主任,说是临时性的。到报社后,社长兼总编刘健让我主管分社编辑工作。因是到一个新地区,对新创办的报纸就有一种新鲜感,比较注意翻阅和思考,颇有大众性、战斗性和通俗性等特色,并在编委会上谈了自己的看法,也就某些编辑业务和技术问题提出一些改进意见。

此后不久,即调往济宁市鲁中南建国学校,校长由鲁中南行署主任李乐平兼任,我担任副校长。当时,鲁中南大片地区陆续解放,全区基本上连成一片,为培养各项事业的建设人才,学校招收的学生几乎是交通要道沿线流散的青年。学校设有民政、文教、医务、财政和新闻等几个专修科,因前任领导即将调往省城,我主持学校工作属于接替性质,除团结一班人做好思想工作和教务管理,按计划完成教学任务外,还为新闻专修班讲过几堂专业课。经过一段时间,对加强集体领导略有改进,但个别学生中仍存在一些问题,说明思想教育还有薄弱环节。到 1949 年秋冬之间,学生陆续分配工作,学校也迁回鲁中沂水县境。

1949 年 12 月,我便离开学校调往省城,到济南人民广播电台,台长是高扬,我任副台长。次年 10 月,山东人民电台开始广播,济南台改为经济台,由省台兼管,台长王夷黎,后为张明,我兼任编辑室主任,主要是协助台长做好广播宣传工作。那时,比较注重突

击性的宣传任务和日常性的教育节目。如党政机关的重要活动、镇压反革命运动、新中国成立周年庆典活动以及苏联红星歌舞团访问演出等,都曾作过现场实况广播或录音剪接报道,并组织收音站集体收听,有些还当场插播一些地方听众反响,社会效果较好。

社会教育有《干部学习》、《省政讲座》和《军人》、《青年》、《农村》等节目。其中,《干部学习》是中央山东分局和省政府向全省干部进行教育的"空中课堂",成为"及时、系统地输送政治、理论、时事等方面精神食粮的好工具"。《省政讲座》还专设主讲委员会,由省政府领导担任主任委员,每月向各主讲部门通告广播选题和时间,并组织各部门收听和反映收听情况,以便改进。电台也一直重视调查研究,加强广播宣传的针对性。我和编辑张军曾去淄博矿区作过调查,写出一份调查报告,后经研究召开全省收音站工作会议,就以此为依据并综合其他材料,提出加强和改进收音站工作的若干建议和意见。

在主持省台宣传工作中也有不足之处,特别是新闻节目没有放在重要位置,除《纪录新闻》外,省台播音以后,每天仅有早晚两次新闻,又主要是选编报纸的新闻稿,很少有自己特色的广播新闻,这为电台留下了一个需要认真改进的问题。

1953 年 4 月,我调到北京,先后在中央广播事业局总编室的听联组和对内部的工业组、新闻组工作。初到高层广播宣传单位,因是层次高,把关紧,要求严,自有一个熟悉和适应过程,也较能严格对待。其间,曾去唐山、鞍钢、太原及榆次,对新建项目作采访报道。1954 年 11 月,在康藏、青藏公路即将全线通车期间,总编室派我去南线采访,并要求及时传回通车典礼的实况新闻录音,故同去的有录音科和藏语组的两位同志。从康藏公路的起点安康到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,汽车一路西进,我们一路采访。在近 20 天的时间内,先后发回 10 多篇报道,主要反映进藏部队、民工修建公路和藏

族同胞支援部队的英勇事迹,以及公路沿线的新变化和新面貌,并在通车庆典结束之时,我们即去邮电局传回文字和实况录音。不过,最后一篇通讯《到达拉萨》,竟误传到人民日报社,以其记者的姓名在该报刊登。

此后,因是冬季,高原封山,交通不便,我们仍留在拉萨,在附近地区继续采访,到次年初夏才由原路乘长途汽车返回,进行总结汇报。组织上让我向部分同志介绍西藏的变化和自己的体会。这时,我也调到中央台新闻组主持近半年的工作。

1955 年 8 月,在从事新闻工作 10 年后,由组织推荐并经考试,我到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学习,这是深造的极好时机,自己也很珍惜。两年中,系统地学习了哲学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、中共党史以及中外历史,学习了新闻学、语言学、逻辑学等课程,使我弥补了“先天性”的不足,在政治理论和专业知识上具有较为坚实的基础。这对以后从事业务、研究和教学是重要因素或动力。特别是在拨乱反正后的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,我尚能辨明是非,态度明朗,方向对头,并顶住了外界的某些压力,实是党的教育和党校的培养,否则也会走偏方向,在教研中犯政治性的错误。

1958 年初,我从党校毕业回到广播事业局,当时正在筹建局业务研究室,组织上要我参加筹备工作,左荧同志兼主任,后来我任副主任。开始,主要是收集中央有关广播事业的各种文件、事业建设和广播宣传的重要纪事,汇集编辑成册,作为内部参考和研究资料。其间,我也先后前往一些省市收集旧中国的广播事业各类材料,并从不同性质和功能方面分别作些初步研究整理,在《广播业务》上刊载。这样,在一年多时间内,业务研究室已有编辑、翻译和研究等新闻专业人员,力量较强,颇有生机,也初具规模。这是党组织的重视和支持。

三　调往广播学院

1959 年 8 月，北京广播学院即将建成开学，中央广播事业局派去一批干部担任院系领导，左荧任学院副院长兼新闻系主任，我为副主任。组织上说，业务研究室也随去学校，由新闻系代管，仍属广播事业局的建制。

固然，我在解放前后做过专科学校的教育管理工作，但从新闻业务、新闻研究转向新闻教学管理，毕竟是一项新的工作。当初，我感到学院的领导集体班子强，重视德育，同心协力，又注重实干，勤于建业，领导有方，在这种集体带动下，我也较能尽力而为，贯彻德才兼备的教育方针。例如：

在教材建设中，新闻和文学尤应体现“德育”为主的指导思想，对新编的个别文学教材感到问题较多，就提出个人看法和修改意见；

为使学生的知识面广，开设“社会知识”之类的专题讲座，正符合培养新闻专业人才的需要，也富有自身的特色；

要使学生养成或具备较为坚实的基本功，对编采、摄像、播音专业提出要培养学生“笔头”、“机头”、“嘴头”的三过硬；

其间，我也先后两次带领师生到京郊红星公社和通县农村参加“社教”活动和实际锻炼，使教学和劳动生产相结合。

1966 后 6 月初，“文革”开始，不少学生跟着“造反”，特别是“四人帮”先后来到学院煽风点火，并定为“黑据点”，从此学院大乱，我也成为第一批被打倒的对象，接受批判和审查。当初确也担忧，后来耳闻目睹，被打倒的老干部越来越多，心想这就没有问题了，事情总会是搞清楚的。事后，我听说有位军代表说过，当年康荫不去投靠国民党而要投奔延安，这本身就说明问题。我听了很激

动,认为还是军队的干部实事求是!

1969 年秋,我先去河北望都县劳动,到 1970 年八九月间返回北京。同年 11 月,又随教职员工下放河南淮阳广播事业局“五七”干校,我一边劳动锻炼,一边“交代检查”。先在大田干活,后去喂猪,都注重实干,曾一人多次去几十里外的地方拉饲料,自己配料、调料甚而尝料,尽量适合猪的胃口;又常在中午细心观察猪群的习性和动向,过一段时间摸索出某些喂养方法——粗料精喂、精料细喂、少料巧喂,猪群长得肥壮,让我在校有线广播站介绍“经验”。这样,引来其他连队的一些饲养员观看“取经”,广播事业局的文工团还编了一段“大鼓”(已记不准曲调)在晚会上演唱。其实,我在喂养中也记下一首类似打油诗的《养猪歌》。现录两段:

猪要长膘不在料,全靠猪倌照料好;
三分饲料七分调,一颗红心永向党。
我来喂猪猪长膘,一天三饱两个倒;
喂得猪身壮如牛,肥头大耳走路摇。

此后,问题清楚,我被“解放”。1972 年,先去淮阳县作整党的联络员,工作告一段落后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理论组,主持宣传工作,也参与编辑稿件,或去某些省市组织节目。不久,调到专题部,主要是对理论、科技、卫生、体育节目的初审,做好“把关”工作。也随体育采播人员到体育场进行现场实况广播,并前往河北、河南和广东农村转播球类比赛实况或实况解说录音。

1976 年 10 月,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,一举粉碎“四人帮”反革命集团,结束了长达 10 年的内乱。电台开始清理和批判他们控制广播舆论阵地、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的流毒和影响。在专题节目中,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: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